

試析「的」字結構之兩岸異同

——兼論口語與書面語差異*

劉德馨 李慧君 于世超**

摘要

「的」字結構在中文出現的頻率極高，不論在語義或語法的定義與分類極為複雜，歷來許多學者已從不同面向對「的」字結構進行研究，但對於兩岸用法是否有所差異，著墨不多。本研究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比較兩岸四位人文領域的大學教師「的」字結構於口語和書面語之異同。本文發現兩岸教師在書面語的「NP 的 VP」用法不同，臺灣教師在寫作時，偏好突顯賓語，將賓語作為「參照體」來建立和相關目標的心理聯繫，大陸教師則無此偏好。兩岸教師書面語裡動詞名物化使用的差異性，除了映證語法的漸層性 (gradience) 外，也呼應了 Thomas Wasow (2009) 所言，語言結構的漸層性並非來自於使用者的語言表現 (linguistic performance)，相反地，語言使用者是有意識地選擇要使用的語言形式，這正是說話者的語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的最佳展現。

關鍵詞：認知語言學、「的」字結構、語法漸層性、參照體、作格化

2018年11月7日收稿，2019年5月6日修訂完成，2020年1月14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由第一作者在2017年11月25日臺灣語言學學會所主辦的「臺灣語言學研究論壇」上口頭發表，獲得何德華教授和陳純音教授的寶貴建議。本研究感謝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104年度邁向頂尖大學學術領域全面提升計畫小額研究經費之補助。

** 作者分別係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通訊作者）、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講師、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

一、前 言

語言學家長期以來關注語言本體研究，以及「理想的說話者和聽話者應該具備哪些語言能力」，而一個語句是否合乎語法，也只能落在「正確」與「錯誤」兩個極端值。但社會語言學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便已提出，同屬一個社群的說話者，其語音、語法和使用的詞彙，呈現了相當大的異質性，這些異質性並非雜亂無章，當社經地位、性別、世代等被納入考量後，看似無法解釋的變化其實呈現了非常明顯的規律性（*orderly heterogeneity*; Weinreich, Labov, and Herzog 1968）。在語法學領域，七十年代末期，Lakoff（1977）提出，一個句子的整體意義並非由句子裡的單字語義加總得出，Lakoff 並於 1987 年提出「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一詞，這個功能主義取向、基植於經驗論的學派也於八十年代開始，受到愈來愈多的關注。

Fillmore 等（Fillmore, Kay, and O'Conner 1988）接著提出，語言中有許多部份是傳統的生成語法無法解釋，卻又隨處可見的。Goldberg（1995）進一步指出，英文中有許多語法現象，並不能由詞彙本身的特質或語法規則的應用所衍生，而是由特定的構式所形塑而成，並將「構式」定義為「結構與意義的配對」，是組成語言結構的主要成分。對認知語言學家及許多功能語法學者來說，意義應具有下列四項特徵（Geeraerts 2006）：（一）意義具有觀點（*perspective*），文法並非全然客觀，而是說話人用來表達特定概念化結果的工具。而詞語句式的選用，很大部份取決於說話人所要採用的角度。（二）意義具有活力與彈性，意義並非非黑即白，一成不變。真實語言中的意義會隨時代、語境做某種程度的延伸與微調，但意義之間仍具有相似性與連續性。（三）意義或文法並非全然獨立自主，而是與其他背景知識與認知系統密不可分，因此語言中有許多詞語的創造與文法的運作，與「隱喻」（*metaphor*）、「借喻」（*metonymy*）或「意象基模」（*image schema*）有關。（四）意義來自生命經驗與語言的使用。

不論是 Labov 系列研究的社會語言學領域，抑或以 Lakoff 為首的認知語言學領域，其共同點皆是強調語言結構的漸層性（*gradience*），亦即

在不同時空下、擁有不同生活經驗的說話者，其表現出的語法結構會呈現出動態的、有規律的變異性。Weinreich 等（Weinreich, Labov, and Herzog 1968）便提出，說話者經由生活經驗的積累，知道何種社經地位、性別和年齡的人會表達出那些不同的語言形式，這是說話者天生就有的能力（competence）。接續此一觀點，Kristiansen（2003）從認知社會語言學的角度提出，口音有其社會意義。語言使用者聽到某些語音或語法特徵，會自動歸類至符合其刻板印象的社會階層，此種方言覺識（lectal awareness）是每個說話者都有的被動能力（passive competence）。無獨有偶，Wasow（2009）也認為，不同社群的說話者反映的語言變異性，並非來自於使用者的語言表現（linguistic performance），相反地，語言使用者是有意識的選擇要使用的語言形式，這正是說話者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最佳展現。

基於上述理論脈絡，本研究探討漢語裡出現頻率極高的「的」字結構。前人對於兩岸用語差異研究甚豐，但對漢語裡出現頻率甚高的「的」字句，兩岸用法是否有差異，卻鮮有著墨。「的」字句不論在語義、語法或語用上的定義與分類極為複雜，歷來許多學者已從不同面向對「的」字結構進行研究，但對於兩岸用法差異的研究仍待補足。本研究以觀察兩岸四位人文領域教師於口語和書面語的語料，比較兩岸用法之異同點，並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差異所在。

二、文獻回顧

（一）語言的漸層性：方言差異研究

使用同一個語言的說話者，會因為時空背景不同，其呈現的語言形式也有些許差異。以英語的雙賓構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為例，學界對於該構式在不同方言的語法變異性，已有相當多的研究（Bresnan, Cueni, Nikitina, and Baayen 2007; Bresnan 2006, 2007; Fellbaum 2005）。Bresnan 等人（2007）以統計分析預測美式英語說話者對於 give 這個動詞後面的接收者的生命度（animacy），並從「以使用為基礎的理論（usage-based theory）」之角度，指出一個語言的語法建構必須要有夠大的輸入量

(input)，而輸入量來自他人給予的語言刺激。語法是動態的結構，會隨著時間和空間而改變；換而言之，使用同一個語言的說話者，由於身處不同的時空背景，其詞彙、構詞、語法等表現，便會有些許的不同。Bresnan 和 Hay (2008) 進一步比較紐西蘭英語和美式英語的雙賓構式，發現紐西蘭英語較能接受動詞後面的接收者是無生命的（例如 This gives **the plot** a new twist），也就是對「給予類的動詞後面必須是有生命的接收者」這個潛規則沒有那麼要求。此外，不同世代的紐西蘭人士對於雙賓構式的使用也有不同的偏好，隨著時空的更迭有所改變，老年人和年輕人偏好使用介系詞構式（如 John gave the book to Mary），而中年人則偏好使用名詞構式（如 John gave Mary the book），這些細緻的變異證明了語法的漸層性（gradience）。Wasow (2009) 指出，過去主流的生成學派認為語法結構的正確性是絕對的，然而在請受試者做語法判斷時，常會使用問號（？）來標示某些句子，其實已經默認了語言結構並不是只有正確或是錯誤兩個極端值，語言結構也並非均質的，而是呈現一種漸層性（gradience）。語法的漸層性展現於合成詞的共現性（compositional collocations）、雙賓構式的使用偏好（即較常使用介系詞構式或是名詞構式）等。語言結構並非均質單一，在正確和錯誤兩個選項之間，其實存在一個連續體（continuum），同一語言的說話者，會因為其身處不同地區、擁有相異的生活經驗，發展出不同的語言表達形式。而即使是同一個地區的說話者，也會因為世代差異，發展出不同的語言使用偏好。

中國大陸與臺灣雖然都使用漢語，但是無論在語音、詞彙、語法、甚至語意上皆存在許多差異。詞彙部分，除了「出租車／計程車」、「激光／雷射」、「軟體／軟件」等外來語的翻譯不同外，洪嘉馥、黃居仁 (2008) 利用語料庫進行比對，發現兩岸使用語言的獨特性。以在「警察／公安」這組名詞組為例，與「警察」較常共現的詞彙有「憲兵、軍人、執勤、臨檢」等；與「公安」較常共現的詞彙則有「武警、指戰員、保衛、留置」等。在「做／搞」這組名詞組發現，與「做」較常共現的詞彙有「工作、生意、事情」等；與「搞」較常共現的詞彙，如：「試點、調研、臺獨、外資」等。即使是漢語固有的四字格成語，兩岸用法也不盡相同。以「今

非昔比」為例，鄒嘉彥 (Tsou and Kwong 2015a; Tsou and Kwong 2015b) 使用其在香港城市大學建置的「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 (Linguistic Variations in Chinese Speech Communities)」¹ 分析來自香港、北京、上海、臺灣、澳門、新加坡等多地有代表性的華語媒體語料，發現該成語在香港和臺灣以負面涵義居多，在上海和北京則以正面涵義居多：

(1)

a. 北京

去年，從 A 股募集的資金高達 1700 億元，而這個量僅僅相當於 A 股最高總市值的 1%。中國的 A 股市場已**今非昔比**，紅籌股的回歸也就水到渠成。

b. 上海

雖然，這樣的笑話更可能發生在馬季年輕時代的相聲裡，因為如今普通話在上海的普及**今非昔比**了，但「理髮師」的普通話究竟該達到什麼水平？

c. 臺灣

高雄總廠留守舊員工只好另外租地作遠距離監控，連董事長也在高雄上班，這種處境實在令人覺得**今非昔比**、不勝唏噓！

d. 香港

俄羅斯軍力**今非昔比**，難與北約競賽，雙方對此心知肚明。

同樣地，同一個名詞的意涵，在兩岸也有所不同。鄒嘉彥 (Tsou 2017) 從 LIVAC 語料庫發現，在中國大陸，「泳池」是公共場所，但是「游泳池」則傾向指涉高級的私人運動設施，在臺灣則沒有「泳池」的用法。此外，臺灣華語在量詞的使用，也與中國大陸有所出入。由於閩南語並沒有量詞「顆」，只有「粒」的說法，因此臺灣華語會使用「粒」指涉西瓜，有「一粒西瓜」的用法，然而在普通話，「粒」通常用來指稱細小之物（如「沙子」、「灰塵」）(Tsou 2017)。

兩岸的語言用法差異不僅限於詞彙層面，還擴及語法層次。侯昌碩 (2003) 以臺灣當代小說為語料，分析兩岸漢語的詞性和語法差異，發現

1 「LIVAC 漢語共時語料庫」，<http://www.livac.org>。

在詞性方面，臺灣華語的名詞可以用作動詞、形容詞，不及物動詞用作及物動詞，動賓式動詞帶賓語，皆和大陸的普通話有顯著的差異：

(2)

- a. 外面**春雨**著（名詞用作動詞，王禎和《素蘭要出嫁》）
- b. 謂陳林市既不**美貌**，又不曾看見姦夫，遊街因而不十分好看（名詞用作形容詞，李昂《殺夫》）
- c. **回去**住宿的地方，卻不知道是歡喜還是悲傷地哭了（不及物動詞用作及物動詞，陳映真《雲》）
- d. 你知道，我多麼**生氣**著老告的女人（動賓式動詞帶賓語，施叔青《約伯的後裔》）

兩岸的語法差異不僅限於詞性，王海峰（2009）利用「北京大學 CCL 語料庫」²對《漢語水準辭彙與漢字等級大綱》中 207 個離合詞進行考察，發現在漢語的離合詞使用，實際上「合」是常態（regular），「離」是異態（idiosyncratic），而離合詞插入「了」的離析形式最多。刁晏斌（2016）從王海峰（2011: 45）所列出的 16 個高頻離合詞中選取 10 個離合詞，來進行兩岸使用狀況比較，臺灣以收錄 1951 年至今發行之聯合報系各報新聞全文之「聯合知識庫」作為語料，大陸則以收錄 1946 年創刊至今的「人民日報資料庫」作為語料，透過離析形式與合用形式在兩地同類別語料庫中的數量對比，發現 10 種形式中，普通話使用頻率高於臺灣華語的有 9 個，其中高出兩倍以上的有 6 個，而「鞠了一躬」的使用，大陸則高出臺灣一百多倍。刁晏斌據此推斷，大陸普通話中離合詞「離」的比例普遍高於臺灣。王燕明（2010）指出，離合詞多用於口語環境，正式書面語則較少。王海峰（2009）也發現，離合詞的離合現象多出現在口語化的小說戲劇裡。

從上述回顧可以得知，兩岸雖使用同一語言，用語的差異面向遍及詞彙、構詞和語法。然而，儘管前人對於兩岸用語差異研究甚豐，但對漢語裡出現頻率甚高的「的」字句，兩岸用法是否有差異，卻鮮有著墨。「的」

2 「北京大學語料庫」，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字句不論在語義、語法或語用上的定義與分類極為複雜，歷來許多學者已從不同面向對「的」字結構進行研究，但對於兩岸用法差異的研究仍待補足。下節本文將先回顧「的」字句的相關文獻，期望立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比較兩岸「的」字句用法有何不同，以及口語和書面語的差異。

(二) 先行研究：「的」字句結構

陸儉明(2003)提出將動詞名詞化的「的」字結構分為「甲類」(如「張三寫的」)和「乙類」(如「狐狸的狡猾」)。甲類「的」放在主謂詞組的後面，如「張三寫的」、「個兒高的」；可以作主語、賓語、定語、中心語、謂語。下方例句引自陸儉明(2003)：

(3)

- a. 張三寫的是一首七言詩 (主語)
- b. 小說，我喜歡張三寫的 (賓語)
- c. 張三寫的那首詩有詩意 (定語)
- d. 我買了兩本張三寫的 (中心語)
- e. 那首詩，張三寫的 (謂語)

甲類「的」字句當定語用時，放在名詞組前面，用以修飾後面的名詞。此類「的」字句就是屈承熹(2010)提到的關係子句，用於限定名詞，作用和英文的 *that / which* 一樣 (屈承熹 2010: 281)：

(4)

- a. 建國大綱中要創立的新政府，將會給全人類樹立一個好榜樣。
- b. The new government *which/that* the Jianguo Dagang was to create would be an example to all human beings.

屈承熹(2010: 288-289)指出，漢語的關係子句有兩個語法特徵，分別是中心名詞組的省略，以及一個與中心名詞組同指的「空位詞」(trace)出現。若以前面(3a)和(3d)為例，「張三寫的是一首七言詩」和「我買了兩本張三寫的」，在「的」的後面都可以加上一個一般性的名詞，它們雖作名詞用，但卻是一個 0 形的名詞。此外，此類關係子句多有一個與中心名

詞組同指的「空位詞」，例如（屈承熹 2010: 290）：

(5)

- a. 我上星期看到的那件夾克，賣一千五百元。
- b. *我上星期看到（它）的那件夾克，賣一千五百元。

乙類「的」字句出現在主謂詞組的中間，如「這本書的出版」、「春天的到來」，只能作主語或賓語，如下方例句（陸儉明 2003）：

(6)

- a. 狐狸的狡猾是有名的（主語）
- b. 誰不知道狐狸的狡猾？（賓語）
- c. 這本書的出版讓他大賺一筆（主語）
- d. 大家都期待這本書的出版（賓語）

針對乙類「的」字句（即「NP+的+VP/AP」）結構的研究主題，先行研究著墨甚多，以下方例句來說：

(7)

- a. 這本書的出版
- b. 春天的到來
- c. 長城的偉大
- d. 檸檬的酸

學界對於「出版」、「到來」、「檸檬」、「酸」究竟是動詞或是已經名物化，看法不一（朱德熙 1961：1983；項夢冰 1991；胡裕樹、範曉 1994；司富珍 2002；2004；陸儉明 2003）。討論的焦點主要有以下幾個重點：這個結構的性質是什麼？是名詞性還是動詞？哪個成分是結構的核心？NP 與 VP 的關係是什麼？是偏正關係還是主謂關係？VP 是否已名詞化？此外，這個結構是否與 Bloomfield 所提出的向心結構（endocentric construction）理論相違背，也是討論重點。³

3 Bloomfield (1933) 提出了向心結構 (endocentric construction) 與離心結構 (exocentric construction) 理論：一個結構體中至少有一個直接成分同整體的語法功能一致就是向

朱德熙 (1961; 1983) 認為該結構是名詞性偏正結構，中心詞是「出版」、「到來」，而 NP 和 VP 的關係是偏正關係，「出版」和「到來」仍舊是動詞。然而，該理論無法說明，為何中心語是謂語，但是整個偏正結構卻是名詞性的。

另一派學者認為，該結構是名詞性偏正結構。胡裕樹、範曉 (1994) 便提出，裡面的 VP 作為該結構的中心詞，已經名物化了，「出版」和「到來」已經是名詞，不再是動詞。沈家煊、王冬梅 (2000) 也支持此一論點，他們從 N 是 V 的主語或是賓語，將「NP+的+VP/AP」分成以下四大類：

(8)

a. N 只能是 V 的主語，不能是賓語

我們抵抗敵人 我們的抵抗 (主語) *敵人的抵抗 (賓語)

老師稱讚小王 老師的稱讚 (主語) *小王的稱讚 (賓語)

如果一定要把賓語放在 N 的位置，通常必須加上「對」這個介系詞，例如「對敵人的抵抗」、「對小王的稱讚」。

b. N 只能是 V 的賓語，不能是 V 的主語

我們消滅敵人 *我們的消滅 (主語) 敵人的消滅 (賓語)

政府制定計畫 *政府的制定 (主語) 計畫的制定 (賓語)

值得一提的是，從語義來說，此類句式具有被動義，「敵人的消滅」其實是「敵人被消滅」，「計畫的制定」其實是「計畫被制定」，如同「這本書的出版」，其實是「這本書被出版」。

c. N 可以是 V 的主語，也可以是 V 的賓語

敵人破壞橋樑 敵人的破壞 (主語) 橋樑的破壞 (賓語)

政府保護環境 政府的保護 (主語) 環境的保護 (賓語)

雖然 N 可以是 V 的主語和賓語，但如果從語義層面來看，如果 N 是 V 的主語，便具有主動義，例如「敵人的破壞」，如果 N 原本是 V 的賓語，便

心結構，任何直接成分都不與整體功能一致的結構體就是離心結構。向心結構與離心結構是結構主義的重要概念，然而，石定栩 (2007) 指出，這個理論用來解釋漢語「的」字句及相關現象也並不成功，因此本研究將不深入回顧相關研究。

具有被動義，例如「橋樑的破壞」其實是「橋樑被破壞」。最後一類則是 N 既不能是 V 的主語，也不能是 V 的賓語，通常發生在主語和賓語皆是無生命物體的狀況，如下方例句所示：

d. N 不能是 V 的主語，也不能是 V 的賓語

土地屬於國家 *土地的屬於（主語） *國家的屬於（賓語）

做法符合規定 *做法的符合（主語） *規定的符合（賓語）

沈家煊、王冬梅（2000）認為「NP+的+VP/AP」是一種特殊的偏正結構，具有明顯的名詞性質，該結構中的動詞或形容詞已經「指稱化」和「事物化」。以下方例句來說：

(9)

a. 這本書的**編輯**是老李

b. 電燈是愛迪生的**發明**

(9a)的「編輯」指稱「老李」，(9b)的「發明」指稱的是「電燈」，按照 Langacker (1987) 的觀點，名詞指稱「事物」，動詞陳述事物和事物之間的「關係」，因此「編輯」和「發明」具有名詞性。

石定栩從原理論出發，提出了「典型片語的典型功能」此一觀點。舉例來說，名詞片語的典型功能是充當主語、賓語和介詞賓語，而動詞片語、形容詞片語雖然也能擔任這些角色，卻要受到很多限制，因此，充當主語、賓語和介詞賓語的功能就是名詞片語的典型功能。他指出，「……可以設法證明某些句法功能為名詞片語所專有。如果能確定句子中的某些結構位置只允許名詞片語進入，那麼動詞片語一旦進入這種位置，就可以認定是起了名詞片語的作用，是名物化了（2004: 81）」。以此為基礎，他進一步提出，我們可以把主賓語位置上的動詞片語和形容詞片語看成特殊的名詞片語，經由某種過程轉化而來。而這種過程就是動詞片語和形容詞片語的名物化。

陸儉明（2003）認為，「NP+的+VP」是名詞性結構，但不是偏正結構。他認為該結構是由結構助詞「的」插入「NP+VP」這種主謂結構中間，整個結構的名詞性來自於結構助詞「的」的名詞性（[+N]性）。

汪昌松(2014)則從生成語法切入,討論「這本書的出版」,他認為,該結構整體具有名詞性,在句子層面實現名物化,但是「出版」的動詞詞性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因為「出版」可以受副詞修飾,像「及時」、「不」、「準時」(如(10a)、(10d));「出版」也可以進行 A-not-A 操作(如(10b)、(10c)),還可以與其他動詞組構成並列結構(如(10e)):

(10)

- a. 這本書的及時 / 不出版……
- b. 我不關心這本書的出版不 / 沒出版。(熊仲儒 2010: 76)
- c. 這本書的出版不出版還是個問題。
- d. 這本書的未能準時出版是件憾事。
- e. 這本書的校訂和出版都花了很長時間。

(11)

*這本書的封面和出版都令人不滿意。

如果「出版」是名詞,(11)中的*「這本書的封面和出版」應當是合語法的句子,但是這句話卻是病句。汪昌松(2014)進一步提出,「這本書的出版」中的「出版」經歷了作格化(ergativization),也就是動詞由及物動詞變為不及物動詞,隨著受事者「這本書」的前移,「出版」不能再接受其他名詞性受事成分,和被動句中的動詞類似。從汪昌松對於「這本書的出版」的分析,再回頭檢視陸儉明的分類,可以發現乙類裡的詞組並不具有同質性。舉例來說,「老師的稱讚」是主動義,但是「計畫的制定」其實是「計畫被制定」,具有被動義,也就是經歷了作格化的過程。

因此,本文將部份採用並修正陸儉明(2003)文中的劃分準則。本文認為陸儉明文中歸為同類的「春天的到來」和「這本書的出版」應分為兩類。「春天的到來」中「春天」為「到來」的施事者,主動性強;而「這本書的出版」則可以「出版這本書」的形式重新陳述,意涵不變,「這本書」雖作為主語,卻屬被動,為「出版」的受事者,施事者不在句中出現。因此,本文基植於陸儉明的分類,再添加「丙類」,將「出版」這類已歷經作格化的動詞從「乙類」分出,以做區隔。丙類「的」字同樣出現

在主謂詞組的中間，而主語為受事，即「O+的+V」結構，如「敵人的消滅」、「計畫的制定」等。

綜上所述，本研究贊成汪昌松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是一個被動結構的分析，歷經了作格化的過程，並認為漢語「的」字句應分為三類：

(12)

甲類：張三買的書很好看

乙類：張三的分析很有道理（主動義）

丙類：這本書的出版讓大家很期待（被動義）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甲類「的」字句和乙類、丙類最大的差別是，甲類「的」字句的語法功能較為靈活，可以作主語、賓語、定語、中心語、謂語使用，至於乙類和丙類則只能作主語、賓語和介詞賓語。當甲類「的」字句作賓語（如「小說，我喜歡張三寫的」）和謂語（那首詩，張三寫的）使用時，句子的語法結構較為簡單。前人針對英語的研究指出，書面語的結構較為複雜，長句較多；口語的結構較為簡單，長句較少（Tannen 1985; Gumperz, Kaltman, and O'Connor 1984）。而李世文、陳秋梅（1993）針對中文口語與書寫語的比較研究，除了發現句子的長度與文章的正式性成正比，也發現中文口語的動詞比例高於名詞，而書面體的名詞比例則高於動詞。由於乙類和丙類結構乃由動詞名物化（verb nominalization）演變而來，而 Ure、Ellis（1977）和 Halliday（1994）曾指出，動詞名物化與詞彙密度（lexical density）有正相關，動詞名物化的比例愈高，詞彙密度愈高。一般而言，書面體動詞名物化的比例高。由於乙類和丙類「的」字句只能作主語、賓語和介詞賓語使用，本文也許能夠做出以下的預期：甲類「的」字句在口語出現的頻率較高，而乙類和丙類「的」字句則在書面語較常出現。另外，先行研究已指出，兩岸雖使用同一語言，但不論在詞彙、構詞和語法等層面，皆有些許差異。因此本研究除了比較三類「的」字句在口語和書面語的用法差異外，將進一步比較三類「的」字句的用法是否有兩岸差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得知現代漢語三類「的」字結構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實際使用情況。為使口語與書面語的內容更能相互對應，具有可比性，研究者選取了臺灣地區及大陸地區一共四位人文領域的大學教師語料。本文蒐集了這四位老師的四篇論文，即書面語語料，並轉寫了以這四篇文章為主要內容的講座或課堂口語語料。具體語料情況見表一。

表一 口語與書面語料總量

	書面語語料	口語語料	
	字數	時間	字數
教師一	8291	70 分	20305
教師二	6194	47 分	10700
教師三	7831	32 分	5579
教師四	8131	33 分	6455
總計	30447		43039

研究者將書面論文和口語逐字稿中所有的「的」字句一一標示出來，並根據(12)的分類，歸入甲類、乙類或是丙類。

四、資料分析

本文對「的」字結構的分類標準與例句具體如下。「的」在主謂詞組後面的情況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甲類，陸儉明認為主要可作主語、賓語、定語、中心語、謂語。在本文的語料中，甲類主要作主語和賓語，而作為定語的類型（如「張三寫的那首詩有新意」），本文則認為不屬於純名詞性的結構，而是具修飾作用的小句，應另文討論，不屬本文討論範圍，因此不予計算。以下為語料分類和判斷標準。

(一) 甲類「的」字結構

語料分析中，有許多相仿的形式須剔除，在此說明判斷依據。首先是句末助詞、語氣詞「的」，如：

(13)最早期是不能說我會游泳的，啊，**我會騎馬我會游泳都不能說的。**

(14)不過呀，《切韻》、《廣韻》你像這種，(呃)《切韻》根據研究不到二百零六韻啊，大概是一百、九十幾個韻，**但是也夠麻煩的了。**

(13)、(14)是本文所收集的口語語料當中的句子。雖然在形式上同樣是「NP+VP/AP+的」，但其「NP+VP/AP」部份為一個完整的句子，「的」去除後並不影響句法上的正確性，而只改變了說話者的語氣態度，如(13)可改為「我會騎馬我會游泳都不能說」，(14)也可只說「但是也夠麻煩了」。從語義上也可判讀出整體並不執行轉指或自指的功能（朱德熙 1983），非名詞性質，兩句的功能皆為描述，並非代稱任何本應跟隨其後而被省略的名詞性詞語，也就無法「補回」任何名詞，因此不屬於本文考察範圍內的甲類「的」字結構。

此外，強調句「是……的」的形式與甲類「的」字結構也非常類似，容易混淆。如下方例句所示：

(15)老子的辯證思考當然是**從這個經驗來的。**

(16)「減量」義指，隨著時間變化，某個事物的數量發生了減少的變化，但其仍與以前一樣**是存在的。**

例(15)、例(16)也是所收集語料當中的句子。本文認為這類子句在語法層次上屬於「是……的」固定句式，語用作用為強調特定訊息，並不用以指稱其他物件，其名詞性質程度同樣不強，而較偏向修飾性謂語，因而同樣不屬於本文所討論的甲類「的」字句。例(15)雖有語句反覆自我修復的干擾，但仍可看出說話人意在說明老子思想邏輯的「特質」，本句後半形式類似甲類結構的子句，其實並不指代其他特定名詞性物件。同理，例(16)的「是……的」句型雖形似省去主語的甲類結構，但同樣不是可指代的名詞性子句，而是用以表達「存在」的「情形」不變。

此外，漢語作為一代詞脫落（pro-drop）語言，主語並非句型裡必須強制出現的元素，零代詞有助於保持話題的連續性，此代詞脫落現象在口

語裡更為常見。以下方語料為例：

(17)**現在要說的是**，這個，呃，意在言外其實不是說言內就沒有意，對不對？

(18)**現在講的是**多種條件，不管哪一種條件。

上面兩例都是口語語料中的句子，(17)省略了主語「我」，(18)則省略了「我們」。此類代詞脫落、但主詞可以清楚還原的句型，本研究仍將其列入計算。

最後，與例(15)、(16)在同一「連續體」上，但名詞性更為薄弱的，是形容詞修飾語「的」。「形容詞+的」在句末接於繫詞「是」後單用時，也與甲類「的」字句省去主語而單用謂語的形式類似，如例(19)，但兩者差異仍在於含「的」字的結構整體是否具名詞性。在前人研究中討論重點之一即為甲類是否為省去後接名詞的「修飾詞組+的+NP」結構，而「的」字結構中的動詞或者形容詞應已融入整個結構中，整體轉為名詞而失去原來的詞性，因此後面所接續，或者說「可補回」。形容詞修飾語的「的」雖然同樣可以在「的」後面加上所修飾的名詞，也單獨使用，但其原由卻非如甲類「的」字結構般的，「省略」已被指代的名詞，而是由於定語原來便可單獨於句末作結，作謂語使用，描述全句的主語。如下例：

(19)它表示的兩個主體 X 和 Y 是**相同的**，狀況都是**相同的**。

(20)由於某種情況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不尋常的**，所以它可能是意外，因為是**不合理的**嘛，我們是**想不到的**。

例(19)中「兩個主體 X 和 Y 是相同的」，可以說成是「X 和 Y 是相同的(兩個)主體」，這裏「相同的」是描述全句的主語「兩個主體」的形容詞謂語；同樣的，「狀況都是相同的」便是「都是相同的**狀況**」，這裏「相同的」是「狀況」的修飾語，不論所修飾的名詞是否置於其後，皆為形容詞。例(20)中「某種情況是不合理的」，其實就是「是不合理的**某種情況**」，「不合理的」是「某種情況」的形容詞修飾語；同例中「不尋常的」也是修飾語，即可以說成「是不尋常的**某種情況**」。因此皆不列入計算。

鑑於上述原則，本文收集到的典型甲類範例如下：

(21)

- a. 他在敘事當中，就像**我剛剛舉的**，很簡單的，你吃早餐了沒，的時候。
- b. **他們描寫的**竟是中國人，取的是中國背景，採的是中國故事。
- c. 還是因為辦鹽槽的家業在火車通車後，如**洋狀元所預言的**：「鐵路一通你歪想還能把鹽槽辦下去，有你傾家蕩產的一天！」

(21a)為口語語料，例(21b)與(21c)為書面語語料，皆為甲類「的」字句形式。

(二)「NP 的 VP」結構：乙類「的」字句與丙類「的」字句

如前所述，陸儉明提出將主謂結構與結構助詞「的」所形成的「的」字結構分為甲、乙兩類，奠基於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以 NP 作為動詞的施事者或是受事者進一步細分，一類是「的」前的名詞是動作的發出者，即施事者，這一類結構本文仍將其歸為「乙類」；另一類是「的」前的名詞是動作的接受者，即受事者，此一結構中的動詞即為「作格動詞」，本文提出將此一類另標記為「丙類」。無論是「乙類」還是「丙類」，在句子當中多充當主語、賓語，或介詞賓語。下面例句(22)的前二例為口語語料，後兩例為書面語語，例(23)則為丙類範例，同樣前一例為口語語料，後兩例為書面語料：

(22)乙類

- a. 是，像……我們可以看到，**它們的分歧**非常大。
- b. 隨著**時間的變化**，事件本身一直在延續。
- c. 它和你的農業社會脫了節，**它的坦白無隱**使你不願正視，它吵得你無法繼續你那充滿綺夢的睡眠。
- d. 傳統社會面對「**現代性**」的**衝撞**，所形成的緊張或脫序。

(23)丙類

- a. 從而影響到**義項的分析**。
- b. **劇本的創作**，本來就「行人稀少」，「獨木難成林」，因而影響不大。
- c. 本文同意「**了**」的**不同作用範圍的區分**。

例句(22a)中「它們的分歧」不能說成「分歧它們」，主語「它們」是「分

歧」這一動作的發出者，即施事者，不當「分歧」這一動詞的賓語，此例即劃歸為「乙類」。例句(22b)中「隨著時間的變化」則是「隨著」的賓語；同理，「時間的變化」中主語「時間」為施事者而非受事，此例為乙類。例(22c)中「它的坦白」在句中作主語，而且「它」是「坦白」這一動作的發出者，因此歸為「乙類」。例句(22d)中「『現代性』的衝撞」作「面對」的賓語，而「衝撞」這一動作的發出者即為「現代性」，因此此例同樣歸為「乙類」。

例(23a)中「義項的分析」此一結構為「影響到」的賓語，而結構本身內部則可以將動詞前提成為「分析義項」，在此「義項」很明顯在語義上並非「分析」這一動作的發出者，而只可能是受事者，作為「的」字結構中的賓語，此例即歸為「丙類」。例(23b)是少數丙類結構作主語的情況，「劇本的創作」即是「創作劇本」，主語「劇本」是「創作」這一動作的受事者，本文將其歸為「丙類」。例(23c)的「『了』的不同作用範圍的區分」為「同意」的賓語，結構內部則可以將動詞前提改為「區分『了』的不同作用範圍」，因此這一情況本文同樣歸為「丙類」。

在分析語料時，乙類「的」字句與丙類「的」字結構容易混淆，然其界線劃分的重要關鍵在於，名物化結構中「的」字前面的名詞主語，在語義上是否為主動施事，或是被動的受事，即使是同一動詞的名物化也可能被劃歸為不同的類別，如下例：

(24)根據 **Bybee 的分析** 啊，這就是通過溯因推理。

(25)語義結構分析法不僅適用於**副詞語義的分析**。

(26)可是，我們對**漢語虛詞的瞭解以及分析**呀是比較粗疏的。

例(24)、例(25)、例(26)三個例句中的名物化動詞都是「分析」，也就是說「分析」這一動詞既可以是「乙類」名物化又可以是「丙類」的名物化，而區隔它們屬於不同名物化的最主要標準則是「的」前面的名詞是主動還是被動，即是施事者還是受事者。如果「的」前面的名詞是施事者，則是「乙類」，如例(24)；如果「的」前面的名詞是受事者則是「丙類」，如例(25)和例(26)。

五、數據統計結果

依循上述分類標準，在三類「的」字句標記完畢後，研究者將所有的資料編碼，使用統計軟體 SPSS 進行量化分析，並同時做後續的質性分析。總計共有 352 筆「的」字句，其中甲類 96 筆，乙類 152 筆，丙類 104 筆。在本章節和下一章節將依照量化與質性兩個部份分別說明本研究的發現。

從表二的總計數據可以綜合比較可以發現，「的」字結構在口語語體與書面語體中，出現頻率有明顯區隔，口語中甲類的使用頻率最高，共有 82 筆，佔口語語料一半以上的比例，而書面語中則是乙類為首。以各類型來看：甲類「的」字結構傾向在口語中使用，在書面語中相對較少；乙類「的」字結構則與甲類「的」字結構相反，在書面語中的使用情況較多，在口語中的使用情況較少；丙類「的」字結構則與乙類「的」字結構相似，都是在書面語中使用較多，而在口語中使用較少。卡方統計的結果也顯示，三類「的」字句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出現頻率的確不同，並且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表二 各類型「的」字結構於不同語體中使用總數

		文 體		總 計
		口 語	書 面	
「的」字 結構類型	甲類	82 (55.8%)	14 (6.8%)	96
	乙類	38 (25.9%)	114 (55.6%)	152
	丙類	27 (18.3%)	77 (37.6%)	104
總 計		147	205	352

$$\chi(2) = 103, p < 0.001$$

本文進一步觀察兩岸地區，三種「的」字句用法在口語和書面語是否有差異，統計結果如表三所示：

表三 兩岸口語、書面語中「的」字結構總數

		文體	
		口語	書面
臺灣地區 $\chi(2)=83.6$ $p<0.001$	甲類	30	5
	乙類	8	59
	丙類	5	60
大陸地區 $\chi(2)=36$ $p<0.001$	甲類	52	9
	乙類	30	55
	丙類	22	17

由表三可見，不論是臺灣或是大陸，三種「的」字句用法在口語和書面語的出現頻率都達到了統計上的顯著：口語時，甲類最多，書面體則乙、丙類最多。顯示三種「的」字句用法並沒有地區的差異。但本文也注意到，臺灣地區在書面體，使用丙類的頻率似乎又更高，和大陸地區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接下來要分別檢視口語和書面體三種「的」字句用法是否有地區的差異。

表四 檢視口語和書面體三種「的」字句用法之兩岸差異

		地區	
		大陸	臺灣
口語 $\chi(2)=4.87$ $p=0.088$	甲類	52	30
	乙類	30	8
	丙類	22	5
書面 $\chi(2)=17.0$ $p<0.001$	甲類	9	5
	乙類	55	59
	丙類	17	60

表四中可見兩岸教師三種「的」字句用法在口語方面是沒有顯著差異的 ($p=0.088$)，甲類用法在兩岸地區同樣都比乙、丙類多。然而在書面語方面，兩岸教師的三種「的」字句用法則有顯著差異，臺灣地區教師使用丙類「的」字句的頻率高出大陸地區三倍以上，而在大陸地區則是乙類用法較多。接下來本文將從質性的角度，分析兩岸地區「的」字句於口語和書面語之差異。

六、質性分析

(一) 三類「的」字句於口語及書面語之差異

Chafe (1982)、Holliday (1979) 與 Chafe 和 Tannen (1987) 等人對於英語口語和書面語的差異研究發現，口語具有非正式、高度依賴語境之特徵，因此詞彙密度 (lexical density) 較低；而書面語具有正式、典雅、低度依賴語境之特徵，故詞彙密度較高。Holliday (1989: 81) 並指出，英語的口語和書面語是兩種不同的呈現經驗的方式，口語是動態的 (dynamic)，使用放映電影的方式來呈現經驗，因此會使用較多的動詞來描述進行的過程或發生的事件。書面體則是靜態的 (static)，作者多以欣賞懸掛在牆上圖畫之方式來呈現其經驗，讀者看到的是完成後的靜態作品，因此多用名詞來描述。至於中文口語和書面語的比較研究，李世文、陳秋梅 (1993) 首先分析兩種語體在主題串 (topic chain)、詞彙密度 (lexical density)、動名詞比例和動詞名物化現象 (verb nominalization)、訊息流動 (information flow) 等面向之差異。在動詞名物化部分，他們的研究結果大致呼應 Holliday 之論點：正式書面語裡名詞的比例最高，約有 55.3%，而口語的名詞出現比例則是 49.2%。⁴ 陳宇萱 (2014) 以語料庫為本針對現代漢語口語及書面體之研究，也得出類似的結果。

正因為書面語的名詞比例較高，因此動詞名物化 (verb nominalization) 便是書面語 (尤其是學術性文章) 常見的現象。Halliday 和 Martin (1993) 還指出，名物化將原本表示一個動作的過程轉化為一個抽象的現象，屬於一種文法上的隱喻 (grammatical metaphor)。本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以「的」字句來看，中文大致呼應 Halliday 之論點。本文的統計結果顯示，兩岸教師在書面語的動詞名物化用法 (即乙類和丙類用法) 較甲類多，且具有一致性，這顯示了動詞名物化和語體的正式度具有一定的相關性。Ure 和 Ellis (1977) 也指出，動詞名物化 (verb nominalization) 提高了詞彙密度 (lexical density)，也就是每個句子所包含的訊息量大，用字遣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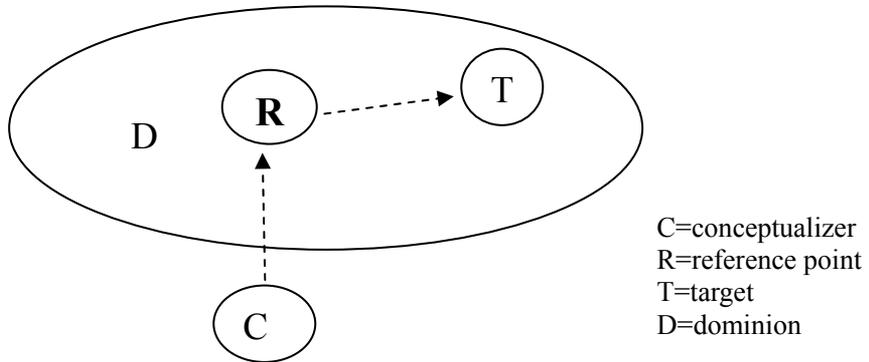
4 張正生 (2005)、陳宇萱 (2014)、馮勝利 (2005) 等人也從不同角度分析兩種語體之異同，但並未特別關注動詞名物化之部分。

力求精簡，因此書面語名物化的比例高。此外，口語受限於短期記憶的限制和言談時間的壓力，而書面體則有較多的時間來思考，因此動詞名物化在書面體的比例較高。

(二) 動詞名物化：兩岸差異

動詞名物化在書面體的出現頻率較高，但是兩岸教師的偏好用法有所不同：臺灣教師在書面體較偏好丙類用法，也就是將作格動詞名物化，整個「NP 的 VP」為被動義，而大陸教師的乙類（即「NP 的 VP」為主動義）用法較多。本文認為這可能跟兩岸教師習慣強調的焦點不同有關。按照 Langacker (1987) 的觀點，名詞指稱「事物」，動詞則陳述事物之間的「關係」。依循此一脈絡，沈家煊、王冬梅 (2000) 進一步指出，當動詞的功能由陳述變為指稱，就是動詞的「指稱化」，當動詞從表示「關係」變為表示「事物」，就是動詞的「事物化」。不論是「指稱化」或是「事物化」，皆是為了突顯一個「目標 (target)」。他們把「NP 的 VP/NP」視為一種「參照體—目標」構式。「參照體—目標」構式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 此一概念由 Langacker (1991; 1993; 1999) 提出，他將參照體 (reference-point) 定義為「喚起一個實體的概念之能力，以便建立與另一個實體的心理接觸 (mental contact)」(Langacker 1999: 173)，進而提高他人對於這個目標的注意力。他以暗夜裡的天上繁星為例，說明有些星星較亮，可以馬上吸引他人的注意力，有些星星則較不引人注目，這時候，若是這些不明亮的星星旁邊有個顯著的參照點，便可以導引他人的注意力至旁邊較為隱晦的星星。換而言之，我們藉由一個認知突顯度較高的參照點，來理解一個突顯度較低的目標。

典型的參照點結構包括概念化主體 (conceptualizer)、參照體 (reference point)、概念化目標 (target)、以及概念域 (dominion) 四個成分。以 Mary's house 為例，house 是概念化目標，聽話者對於這個目標的了解是透過 Mary's 這個參照體來實現的，如圖一所示：



圖一 參照體結構 (Langacker 1999:174)

虛線箭頭表示心理路徑，粗黑體字 R 表示認知過程中的突顯成分，說話者透過參照體，對認知目標進行概念化。從語用的角度來說，參照體可以導引聽話者的注意力，並對後面出現的認知目標有某些預期。以「廚房裡有炒菜鍋」為例，「廚房」是一個參照體，讓聽話者對之後出現的名詞有基本的預期，後面的名詞「炒菜鍋」符合我們對於廚房裡會有的事物的預期。因此，當我們聽到「？廚房裡有枕頭」會覺得奇怪，因為一般來說，枕頭這個目標不會出現在廚房這個參照體。以 Langacker 的理論為基礎，沈家煊、王冬梅（2000）考察漢語裡「NP 的 VP」格式，將此一格式稱作「參照體-目標」構式，並指出「參照體」和「目標」之間存在一種不對稱的關係。一般來說，要指稱一個目標，則必須借助一個比較大的參照體，如下方例句所示（沈家煊、王冬梅 2000）：

(27)

- a. 湖中央的小島（以湖中央為參照體確定目標「小島」）
- b. *小島的湖中央

(28)

- a. 茶壺的把兒（以茶壺為參照體確定目標「把兒」）
- b. *把兒的茶壺

從認知的角度來說，我們習慣將「整體」當作參照體，突顯後面的「目標」：

和抽象的事物相比，具體的事物也是一個較好的參照點 (Langacker 1991: 171)。而動詞名物化以後，此「參照體-目標」的構式原則仍然相同，但是可以突顯的對象，則視動詞本身的語義而定，以下面例子來說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29)

- a. 我們的抵抗
- b. *敵人的抵抗

(30)

- a. 敵人的消滅
- b. *我們的消滅

沈家煊、王冬梅認為，當 VP 是心理動詞時，作為參照體的 NP 總是主語而非賓語，以(29)為例，要識別抵抗行為，只要看抵抗主體即可，不需要知道進攻者是誰，因此「我們抵抗敵人」可以改為「我們的抵抗」而非「*敵人的抵抗」。但是有些動詞的賓語信息度高於主語，動作結果和賓語的直接關係較大，例如「消滅」，是否已經被消滅，要看的是賓語，這解釋了「我們消滅敵人」可以變成「敵人的消滅」，但是不可以改成「*我們的消滅」。前面提到，本研究認為這一類構式多具有被動義，是動詞作格化後的結果。而本文的統計結果顯示，兩位大陸教師書面語的乙類用法較多，兩位臺灣教師書面語的丙類用法較多，這可能顯示了臺灣教師在寫作時，偏好突顯賓語，將賓語作為「參照體」來建立和相關目標的心理聯繫。以下方臺灣教師的書面語例句來說：

(31)

- a. 大家把「**現代主義**」**藝術的提倡**，視為是以「現代性」為核心之社會改造。
- b. 這可視為是對於「**現代性**」的**擁抱與認同**。
- c. 古代中原文化對於**天的認識**，就是它的高和它的大。
- d. 古人對**天時節氣的研究**有其實用的要求。

Taylor (1994) 認為，作為參照體的名詞需要有較高的信息度和可及

度 (accessibility)，即相關概念從記憶裡提取的容易程度。一般來說，話題 (topic) 具有較高的可及度，適合當作參照體。以(31a)為例，從上下文看，「現代主義藝術的提倡」原句語義應為「大家提倡現代主義藝術」，但是賓語 (即「現代主義藝術」) 的信息度高於主語，也是作者想要強調的部分，因此作者便將「現代主義藝術」提前，形成了「NP 的 VP」結構。從認知的角度來說，原本作為賓語的名詞被提到前面，成為「NP 的 VP」構式的「參照體」，便提高了賓語的「信息度」和其概念的「突顯度」。同理，(31d)原句語義應為「古人研究天時節氣」，但對於作者而言，「什麼東西被古人研究」，比「誰研究天時節氣」更為重要，因此作者將賓語提前，形成「NP 的 VP」，以便進一步提高賓語的「突顯度」。

為何臺灣教師較偏好突顯賓語呢？當本文進一步分析比較乙類和丙類「的」字句在句中的語法功能，發現兩類結構雖都是動詞名物化的結果，但是丙類在句中做介系詞賓語使用的比例更高：

表五 乙類和丙類之語法功能

	語法功能		
	主語	賓語	介系詞賓語
乙類	17.85%	82.15%	0%
丙類	31.58%	26.32%	42.10%

要注意的是，表五裡的主語和賓語「的」字句為前面沒有任何介系詞之結構，如(32a)和(32b)。至於介系詞賓語，則為前面有介系詞之「的」字句結構，不論在句中作主語或是賓語使用，如(32c)和(32d)。從表五可以發現，丙類「的」字句前面接介系詞的比例超過四成，至於乙類「的」字句作賓語使用的比例最高，超過八成，但是完全沒有介系詞賓語的例句。

(32)

a. 劇本的創作，本來就「行人稀少」，「獨木難成林」，因而影響不大。

⇒作主語

b. 「偏離」義也不是時間意義的，可看作「相異」義的進一步引申。

⇒作賓語

c. 本文對「還」和「了」的分析只是初步的。

⇒介系詞賓語作主語使用

d. 資源全往大都會集中，結果就造成了鄉土社會在經濟上的難以維持。

⇒介系詞賓語作賓語使用

丙類「的」字句作介系詞賓語使用的比例高，即可能是因為此類結構原本就是將受事賓語提前，而漢語裡的介系詞（即副動詞），乃從動詞語法化後演變而來，仍舊殘留著原本動詞的些許特徵，因此後面可以接上賓語提前的丙類「的」字句。而乙類和丙類「的」字句不同的分布狀況，更加支持本研究將丙類獨立劃分之論證。

（三）「NP 的 VP」：名詞抑或動詞？

前文提及，先行研究對於「這本書的出版」和「春天的到來」這類結構究竟是名詞抑或動詞，並無共識。朱德熙（1961；1984）認為該結構是名詞性偏正結構，但「出版」和「到來」仍舊是動詞。胡裕樹、範曉（1994）和沈家煊、王冬梅（2000）則認為，該結構是名詞性偏正結構，且「出版」和「到來」具有明顯的名詞性質，不再是動詞。至於汪昌松（2014）則認為，該結構在句子層面實現名物化，但是「出版」的動詞詞性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因為「出版」可以受副詞修飾，像「及時」、「不」、「準時」（如(10a)、(10d)），也可以進行 A-not-A 操作（如(10b)、(10c)），還可以與其他動詞組構成並列結構（如(10e)）。本研究雖同意汪昌松對於丙類「的」字句的動詞作格化觀點，但對於「出版」的動詞地位則持保留的態度。一般動詞可以採動詞重複的形式表示嘗試或是程度較輕的意味，但是「NP 的 VP」裡的 VP 不能重複，如例句(32a)。也就是說，「NP 的 VP」裡的 VP，殘留的動詞特徵已經相當少。此外，以(32b)來說，「出版」也可以和只能作為名詞的「封面」並列使用：

(33)

a. *這本書的出版出版

b. 這本書的封面、編排和出版花了我們很多時間

換而言之，「這本書的出版」裡的「出版」雖經歷了作格化的過程，隨著

受事「這本書」的前移，「出版」不能再接受其他名詞性的受事成分，但是一旦名物化以後，由於被動義的「NP 的 VP」只能出現在主語、賓語的位置，或是置於介系詞後，因此整體結構呈現名詞性。以下面三例丙類句子來說：

(34)

- a. 「**現代性**」的制約，不僅深刻的影響到人們的生活習慣，思維方式。
(當主語)
- b. 講究節奏，講究**旋律的進行**，講究**主題的反覆呼應與發展**(當賓語)
- c. 第三點則凸顯它們對於「**現代**」的擁抱(介系詞賓語)

至於「NP 的 VP」裡的 VP 詞性，從功能語法的角度來說，原本的 VP 經過名物化後，動詞性減弱，已不再是一個「原型動詞」(prototypical verb)。以語料蒐集到的例子來說：

(35)

- a. 這是現代性的一**種強調**
- b. 「活過來」是對「死」之前的狀態的一**個恢復**

上面兩例皆出自口語語料，屬於丙類「的」字句，句中名物化後的「強調」和「恢復」可以被數量詞「一種」、「一個」修飾，可以說具有明顯的名詞性質。也就是說，如同漢語裡的副動詞(coverbs)「把」、「比」、「在」、「從」等，從動詞演變而來，歷經了語法化的過程，從實詞演變為虛詞，最初動詞語義裡有的「動作」本質也消失了，但是每個副動詞演變的速度不一，但即使如「動詞性」很低的「把」(屈承熹 2010)，仍在某些狀況下殘留動詞的特徵，例如「把關」、「把風」。回到「NP 的 VP」裡的 VP 詞性，本研究認為該 VP 不論是乙類結構(如「大腦的**活動**」)的名物化、或是丙類的作格化產生的被動義(如「人物性格的**把握**」)，其名詞性成分較高，動詞成分相當弱，因此較偏向名詞。

七、結 論

綜合以上討論，本研究的結果可歸納如下。先行研究指出，中文口語

的動詞比例高於名詞，書面體的名詞比例則高於動詞，本文收集到的語料也發現，動詞名物化後的「NP 的 VP」結構，在書面體出現的頻率較高，至於甲類「的」字句，在口語出現的頻率較高，這印證了 Halliday 的研究結果，即口語是一種動態的過程 (a dynamic process)，故傾向用動詞來呈現說話者的經驗；書面體是一件靜態的物件 (a static object)，因此偏好使用名詞來呈現作者的經驗，此一傾向也說明了為何書面語裡的動詞名物化比例會高於口語。

此外，Bresnan 和 Hay (2008) 曾指出，說話者語法的建構乃是從他人的語言產出學習而來，不同社群的說話者，有不同的語言學習對象和生活經驗，造就了相異的語言學習經驗，因此同一語言的語法也會呈現漸層性 (gradience)。而語言使用者聽到某些語法或語音特徵，會自動賦予該特徵特定的社會意涵或是地域意義，並歸納至符合其刻板印象的社會階級裡，此種歸類的能力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屬於被動能力 (passive competence) (Kristiansen 2003)。兩岸雖使用同一語言，但在詞彙、構詞和語法等層面，則有些許差異。本研究分析臺灣和大陸共四位大學教師的口語和書面語結構，發現臺灣和大陸地區對於三類「的」字句的使用頻率，在口語中的相對比例是相同的，皆是甲類大幅高於乙、丙類，此結果符合本文的預期：甲類「的」字句作賓語和謂語使用時，由於其語法結構較為簡單，因此在口語出現的頻率高，這顯示語言使用者是有意識地選擇在何種文體使用何種語法結構，依照 Weinreich 等 (1968) 的邏輯，此種有意識的選擇乃是語言使用者天生就有的能力 (competence)。然而在書面語中，臺灣地區的丙類則高於乙類，不同於大陸地區是以乙類為首。本文認為這可能跟兩岸教師習慣強調的焦點不同有關。臺灣教師在寫作時，偏好突顯賓語，將賓語作為「參照體」來建立和相關目標的心理聯繫，至於大陸教師則無此偏好。兩岸教師書面體裡動詞名物化使用的差異性，不僅映證語法的漸層性，也呼應了 Wasow (2009) 對於生成語法學者將語言能力和語言表現二分法的質疑。誠如 Kristiansen 和 Wasow 所言，語言結構的漸層性並非來自於使用者的語言表現，相反地，語言使用者不僅有能力針對不同的語言形式歸類、賦予其對應的社會意義，並且有意識的選擇要

使用的語言形式，這正是說話者的語言能力的最佳展現。

本研究分析兩位臺灣教師和兩位大陸教師的書面體和口語語料，發現同樣隸屬於人文領域，臺灣教師在書面體較偏好使用丙類「的」字句。由於篇幅有限，並未針對口語和書面語的其他差異，例如詞彙密度、動詞和名詞的比例、連接詞使用比率等，作出進一步的比較。此外，臺灣教師較偏好丙類「的」字句的深層因素為何？上述議題在本文中尚未處理，可能須從歷時的觀點，梳理兩岸人文領域教師近百年來的學術論文，這有待日後研究者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石定栩 2004 〈名物化、名詞化與「的」字結構〉，《中國語言學論叢》第 3 輯，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頁 78-92。
- 石定栩 2007 〈向心結構與離心結構新探〉，《外語教學與研究》39.4(2007.7): 276-284。
- 王海峰 2009 〈基於大型語料庫的現代漢語離合詞定量研究〉，《華語文教學研究》6:1(2009.6): 59-89。
- 王海峰 2011 《現代漢語離合詞離析形式功能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王燕明 2010 〈淺析離合詞的產生與發展〉，《語文學刊(教育版)》24(2010.12): 1-2。
- 刁晏斌 2016 〈海峽兩岸離合詞使用情況對比考察〉，《海外華文教育》2016.4: 435-446。
- 汪昌松 2014 〈從被動句看「這本書的出版」〉，《語言暨語言學》15.2(2014.1): 231-264。
- 李世文、陳秋梅 1993 〈中文口語與書寫語的比較研究〉，《教學與研究》15(1993.6): 63-96。
- 司富珍 2002 〈漢語的標句詞「的」及相關的句法問題〉，《語言教學與研究》2002.2: 35-40。
- 司富珍 2004 〈中心語理論和漢語的 DeP〉，《當代語言學》2004.1(2004.7): 26-34。
- 沈家煊、王冬梅 2000 〈「N 的 V」和「參照體—目標」構式〉，《世界漢語教學》2000.4: 25-32。

- 朱德熙 1961 〈說「的」〉，《中國語文》1961.12: 1-16。
- 朱德熙 1983 〈自指和轉指——漢語名詞化「的、者、所、之」的語法功能和語義功能〉，《方言》1983.1:16-31。
- 胡裕樹、範曉 1994 〈動詞形容詞的「名物化」和「名詞化」〉，《中國語文》1994.2: 81-85。
- 洪嘉馥、黃居仁 2008 〈語料庫為本的兩岸對應詞發掘〉，《語言暨語言學》9.2(2008.4): 221-238。
- 馮勝利 2005 《漢語書面語初編》。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陳宇萱 2014 「語料庫為本之現代漢語口語及書面語體多面向探析」，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 項夢冰 1991 〈論「這本書的出版」中「出版」的詞性——對動詞、形容詞「名物化」問題的再認識〉，《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4: 75-80。
- 侯昌碩 2003 〈從臺灣當代小說看海峽兩岸漢語的語法差異——兼析兩岸語言融合的態勢〉，《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5.4(2003.8): 98-102。
- 張正生 2005 〈書面語定義及教學問題初探〉，收入馮勝利、胡文澤編，《對外漢語書面語教學與研究的最新發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頁 323-338。
- 屈承熹 2010 《漢語功能篇章語法——從認知、功能到篇章結構》，臺北：文鶴出版社。
- 陸儉明 2003 〈對「NP+的+VP」結構的重新認識〉，《中國語文》2003.5: 387-391。
- 熊仲儒 2010 〈漢語中詞與短語的轉類〉，《華文教學與研究》2010.3: 71-78。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 Bresnan, Joan. 2006. "Is Syntactic Knowledge Probabilistic? Experiments with the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In Sam Featherston and Wolfgang Sternefeld, eds., *Roots: Linguistics in Search of Its Evidential Base*.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77-96.
- Bresnan, Joan. 2007. "A Few Lessons from Typology." *Linguistic Typology* 11.1: 297-306.
- Bresnan, Joan, Anna Cueni, Tatiana Nikitina, and R. Harald Baayen. 2007. "Predicting the Dative Alternation." In Gerlof Bouma, Irene Kraemer, and Joost Zwarts, eds.,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Interpretation*. Amsterdam: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Science, pp. 69-94.
- Bresnan, Joan, and Jennifer Hay. 2008. "Gradient Grammar: An Effect of Animacy on the Syntax of *Give* in New Zealand and American English." *Lingua* 118.2: 245-259.

- Chafe, Wallace. 1982. "Integration and Involvement in Speaking, Writing, and Oral Literature." In Deborah Tannen, ed.,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Exploring Orality and Literacy*. Norwood, NJ: Ablex, pp. 35-53.
- Chafe, Wallace, and Deborah Tannen. 1987. "The Relation between Written and Spoken Languag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6: 383-407.
- Fellbaum, Christiane. 2005. "Examining the Constraints on the Benefactive Alternation by Using the World Wide Web as a Corpus." In Stephan Kepser and Marga Reis, eds., *Evidence in Linguistics: Empirical, Theoretical, and Computational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Generative Grammar.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pp. 209-240.
- Fillmore, Charles J., Paul Kay,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Language* 64.3: 501-538.
- Geeraerts, Dirk, ed. 2006. *Cognitive Linguistics: Basic Reading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umperz, John J., Hannah Kaltman, and Mary Catherine O'Connor. 1984. "Cohesion in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Ethnic Style and the Transition to Literacy." In Deborah Tanner, ed., *Coherence in Spoken and Written Discourse*. Norwood, NJ: Ablex, pp. 3-20.
- Halliday, M. A. K. 1979. "Differences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Some Implications for Literacy Teaching." In Glenda Page, John Elkins, and Barrie O'Conner, eds., *Communication Through Reading: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ustralian Reading Conference*. Vol. 2. Adelaide, SA: Australian Reading Association, pp. 37-52.
- Halliday, M. A. K. 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 Halliday, M. A. K., and J. R. Martin. 1993. *Writing Science: Literacy and Discursive Power*.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Kristiansen, Gitte. 2003. "How to Do Things with Allophones: Linguistic Stereotypes as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in Social Cognition." In René Dirven, Roslyn M. Frank,

- and Martin Pütz, eds., *Cognitive Models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Ideology, Metaphors and Meanings*.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akoff, George. 1977. "Linguistic Gestalts." In *Papers from the Thirteen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April 14-16, 1977*.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pp. 236-287.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onald W. 1993. "Reference Point Constructions."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1-38.
- Langacker, Ronald W. 1999.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Taylor, John R. 1994.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dings of Possessor Nominals." *Cognitive Linguistics* 5.3: 201-242.
- Tsou, Benjamin K., and Olivia Oi Yee Kwong. 2015a. "Some Basic and Salient Linguistic Features across Chinese Speech Communities from a Corpus Linguistics Perspective." In William S-Y. Wang and Chaofen Su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601-614.
- Tsou, Benjamin K., and Olivia Oi Yee Kwong. 2015b. "LIVAC as a Monitoring Corpus for Tracking Trends beyond Linguistics." In Benjamin K. Tsou and Olivia Oi Yee Kwong, eds., *Linguistic Corpus and Corpus Linguistic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5*.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447-471.
- Tsou, Benjamin K. 2017. "Extra-linguistic Determiners of Salient Cross-Straits Linguistic Developments in Chinese: The Big Data Approach." Presentation, "The 29th North 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NACCL-29), Rutgers University. June 16-18.
- Tannen, Deborah. 1985. "Relative Focus on Involvement in Oral and Written Discourse." In David R. Olson, Nancy Torrance, and Angela Hildyard, eds., *Literacy, Language*

and Learning: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p. 124-147.

- Ure, Jean, and Jeffrey O. Ellis. 1977. "Register i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Sociology." In O. Uribe-Villas, ed., *Issues in Sociolinguistics*. The Hague: Mouton.
- Wasow, Thomas. 2009. "Gradient Data and Gradient Grammars." In *Proceedings of the 4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255-271.
- Weinreich, Uriel, William Labov, and Marvin I. Herzog. 1968. "Empirical Foundations for a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In Winfred P. Lehmann and Yakov Malkiel, eds., *Directions for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pp. 95-188.

An Analysis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De 的 Construction” across the Strait and Its Divergence between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Te-hsin Liu,* Hueijun Li** and Shichao Yu***

Abstract

The “de 的 construction” has a high frequency in Mandarin, and its definition as well as classification are complicated syntac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Many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is constructio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however, it is little known as to whether there is any difference of usage across the Strait. Drawing upon a constructional perspective, the current study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of the “de construction” among four university professors in the field of Humanities and Literature. It was found that professors across the Strait have different behaviors in the written usage of “NP de VP” construction. Professors from Taiwan prefer giving prominence to the object, such that the latter is used as a reference point to give mental access to a given target, while professors from China have no such preference. The divergence between professors across the Strait demonstrates the gradience in syntax; meanwhile, it also echoes Thomas Wasow (2009) according to whom the gradience in syntax does not stem from speakers’ linguistic performance; rather, speakers choose consciously the linguistic pattern they are using, which is the best demonstration of speakers’ linguistic competence.

Keywor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de 的 construction”, syntactic gradience, reference point, ergativization

* Te-hsin Liu,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 Hueijun Li, Lecturer,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Shichao Yu, Master’s student, Graduate Progra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